

中
国
谚
语
集
成

1276.7

1

:21

21

中国谚语集成

四川卷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 I S B N 中心

中国谚语集成
四川卷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 ISBN 中心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62.25 插页：17 字数：124.5 万

2004年11月北京第一版 2004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076—0322—9/J·309

定价：160 元

凡例

1.《中国谚语集成·四川卷》是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文件精神,本着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编纂而成的。

2.本卷共收录谚语2万余条,主要是从1984年以来由四川省及各市、地、州、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组织力量,进行广泛普查、搜集、采录的41万条谚语资料中筛选出来的。同时亦采用了我省民间文学爱好者搜集提供的资料。四川是多民族的省份,少数民族谚语占有一定比例。由于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因,四川自秦汉以来,外籍人迁徙入蜀者较多。因而,本卷所收谚语较全面地反映了四川各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谚语流传的概貌。

3.本卷谚语按内容分类编排。全书共分事理谚、修养谚、社交谚、时政谚、生活谚、自然谚、农林谚、风土谚、工商谚、文教谚、格萨尔谚11大类;每一大类又根据谚语的具体内容分为若干中类;有的中类之下又分若干小类。对于内容跨类的谚语,主要视其内容的侧重点归类;对于双重含意的复句谚,则主要根据后一句的内容归类。

4.本卷对方言、方俗、典故、少数民族用语以及其他需要注释的字、词、句适当加以注释。单句谚注码置句号之后;复句谚注涉上句时,置上句标点之后,仅涉下句或兼涉上下句时,置下句标点之后;多句谚以此类推。各条注文,统置当页右下角。一条谚语多处需注时,只用一个注码。需注释的词语多次出现时,只在首次出现时加注。卷后附有“方言及少数民族用语简表”供集中查检。

5.卷内所收谚语的族属,除汉族外,均在谚条之后用括号标示。流传地除仅在局部地区流传的风土谚标至县级行政区,在全省普遍流行的谚语,不再另行标示流传地区。少数民族谚语在采集地名之前冠以族属,中间置间隔号,如“甘孜·藏族”。

6.卷内所收谚语的采集者不作随条署名。卷末附本卷各地、市、州、县(区)资料卷编纂人员一览表、主要谚语提供者小传。

7.本卷行政区划图依据1997年重庆划为直辖市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绘制;谚语普查示意图亦依据1997年前《四川省行政区划图》绘制。

前　　言

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辑委员会指导下,《中国谚语集成·四川卷》在四川省和重庆市所辖市、地、州、县宣传文化部门组织广大文化工作者对谚语进行全面普查、采录和层层汇总选编基础上,经过我们精选编辑而成。全书共收录谚语2万余条(不含异文),基本上可以代表四川和重庆谚海(以下通称四川谚语)中的精品。本卷的成书出版,是四川省和重庆市民族民间文学史上一项旷古未有的荟萃之举,也是两省市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一项意义深远的文化建设工程。它对于加强四川和重庆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交流,对于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各门学科,特别是社会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考古发掘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独在黄河中下游平原,而是呈现出“满天星斗”式的多元化特点。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而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则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中最大最亮的一颗“星斗”之一。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表明,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周时期,四川古巴国、蜀国先民已经进入奴隶制文明时代,创造了灿烂的巴蜀文化。从那时以来,巴蜀文化虽然不断地与外来文化相互渗透,但依然保存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绵延不断,坚守不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由四川和重庆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集体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学,包括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内涵极其丰富、深邃。因此,用科学方法对四川和重庆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调查与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艰巨的历史任务。

为了便于读者阅览研究,现就全书主要内容以及编辑情况作一简略概述。

四川谚语植根于深厚的巴蜀文化土壤

四川谚语源于四川和重庆各族人民从古至今的生产劳动,直接反映人们劳动、生活和斗争经验。

四川省和重庆市地处祖国西南内陆,长江上游,是连结西南、西北和华中的天然纽带。

东西长 1200 多公里，南北长 900 多公里，总面积 56.7 万多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 5%，居第五位。四川盆地跨中国地势第一阶梯东缘和第二阶梯。西部为青藏高原的延伸部分，北、东、南为群山环抱。境内地貌多样，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差异显著、面积相当的地区。西部地区为高原、山地，又分为四川西北高原和川西南高山峡谷区；东部则是典型的盆地，又分为成都平原、川中平原。成都平原面积约 6 千平方公里，是中国著名的冲积平原之一，其主体是岷江冲积扇。平原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自 750 米降到 400 米，极有利于江水自流灌溉。广阔的面积和复杂的地貌，形成了四川和重庆多样的气候条件、土地资源，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水资源和生物资源，为四川和重庆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四川和重庆在历史上就是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汇融之处，对于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起着重要作用。四川和重庆人口众多，民族构成复杂。根据 1% 的抽样调查，1996 年末，仅四川人口总数（重庆市的人口未计算在内）为 8356.5 万，居全国第三位。其中，汉族人口占 95% 以上。还聚居着 13 个世居的少数民族，各个民族人口都在 5000 人以上。其中，藏族居住人口仅次于西藏；彝族为全国最大的聚居区，羌族为全国唯一聚居区。此外，还有 10 个世居少数民族，他们是土家族、苗族、回族、满族、傣族、傈僳族、蒙古族、纳西族、白族、布依族等。

四川和重庆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从重庆市巫山县发现的“巫山人”化石看，早在 200 至 180 万年前，属旧石器时代前期，巴蜀大地已有人类祖先的活动。距今 4 至 1 万年前，有“资阳人”在四川盆地活动。“资阳人”虽然还有若干原始人类的痕迹，但已与现代人极为相似，已进入智人阶段，属旧石器时代后期。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东部、中部、西部均有发现。殷周之际，巴蜀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创造出灿烂的巴蜀文化。1985 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在距今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在四川境内存在着一支与中原文化不同的、相当发达的文化体系，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和面具，工艺之精，规模之巨，举世罕见。四川盆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和治水的成功相联系的。当时，水源丰盛的岷江从山区进入成都平原后，流速陡降，淤决成灾。战国初期，蜀相开明（后为蜀王）即在今都江堰开山分流导江，岷江水患得以消除，郫县、成都一带“民得陆处”（《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这是四川先民变害为利的壮举。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在前人治水的基础上，基本完成了都江堰渠首工程，成都平原无水旱之灾，得灌溉之利，稻田大量开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华阳国志·蜀志》），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天府之国”的得名，实赖于都江堰灌区的富庶。

战国时期，四川便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史籍中有“家有盐铁之富，户有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当”（《华阳国志·蜀志》）。四川地区所生产的丝绸，已经开始销往国外。公元前 4 世纪，四川的丝绸经过“蜀身毒道”远销缅甸、印度，这条路被称为“南方丝

绸之路”，比北方丝绸之路早 500 多年。四川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特别适合农业的发展。而由于交通不便、对外闭塞等原因，四川常常能避免中原的战乱，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到了唐宋时期，四川封建经济空前繁荣，不仅农业生产已达到当时最富饶的江南地区的水平，而且纺织、造纸、印刷、陶瓷、制糖等手工业也相当发达。蜀锦、麻纸、刻书等居当时先进行列，“蜀窑”、“邛窑”等已属名窑，遂宁以蔗汁生产糖霜（即冰糖）闻名全国，井盐生产遍及全川，打井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此外，交通运输业和商业也有相当的发展，商行、牙行兴起，集市贸易繁荣。公元 11 世纪，成都 16 户富商开始发行“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明朝中叶和清朝中叶，四川经济经历战乱后又有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不仅是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而且对全国经济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四川民族工业在艰难的条件下起步。19 世纪 90 年代，四川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萌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轻工业为主体的四川民族工业才有所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党政府和一批高等学校、工厂企业相继迁入四川，四川成为中华民族抵抗日寇的重要战略基地和大后方。在国民党统治区，四川提供了抗战的主要人力资源，是抗战物资的主要供应地，也是抗战财力的主要来源。抗日战争开始后，出川抗战的川军部队有 7 个集团军又 1 个军、1 个师和 1 个旅，总兵力达 40 多万人。川军先后参加了淞沪抗战、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等许多著名战事，军功卓著，王铭章等许多高级川军将领为国捐躯。解放战争期间，四川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争温饱运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之后，分别从川东和川北进军四川，国民党残余部队被歼灭，以刘文辉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宣布起义。1949 年 12 月四川全境获得解放。

四川谚语的产生，可以说源于四川历史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它是在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中，为总结和传播社会生活和生产经验而逐渐形成的。史前时代的四川谚语，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已无法查考。但是，可以肯定，在人类的劳动能力和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水平都还十分幼稚的原始社会中，谚语是难以形成的。谚语的形成，有赖于人类的劳动生产、生活经验积累到一定的高度，同时也有赖于人们的抽象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发展成熟到一定的高度，为了交流和传授生产、生活经验，才一次再次概括提炼，逐渐创造出易讲、易传的谚语来，并口耳相传保存下来。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四川谚语又逐步由认识自然、总结生产劳动经验而广泛涉足于社会生活，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同时，四川人民还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衣食住行之事，以事理德行、时政社交、日常生活、风土民情，统统以谚语形式加以总结和表达。这些谚语的总和，反映了四川人民全部的生活、经济和社会历史经验，成为各族人民世世代代认识生活、陶冶性情、斗争自强、改造社会的指南。古人集录四川谚语及与谚语相关的著述，有书可查的当推明代著名学者、四川人杨慎，他著有《古今谚》、《俗言》，其次有清人范寅的《蜀籁》。“五四”以来，史襄哉《中华谚海》

(1934)、朱雨尊《民间谚语全集》(1935)、吴廉铭《中华成语辞典》(1949)等书，都收录有四川谚语。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出版有《四川成语谚语歇后语韵本》(1980)、《凉山彝族谚语》(1982)、《中国少数民族谚语选》(1985)等，但远远不能反映四川谚语的全貌。

四川谚语是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

本卷所收谚语，涵盖四川省和重庆市两个行政区，人口约1亿3千万，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14个世居民族，具有广阔的巴蜀地域性和广泛的群众性特色。四川谚语的主要特色，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封闭自群，兼容广纳。

四川盆地对外交通困难，自然形成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生活在四川盆地中的四川人民一方面封闭自群，但另一方面又能兼容广纳。这是因为，四川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内陆省份，自然条件优越，相对而言历史上较少战乱，吸纳了许多外省移民。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四川汉族人口(包括重庆市)102 330 134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5.4%。就汉族人口构成而言，历史上的四川汉族原住民很少(已经难以分辨出来)，主要为外来移民。因此，汉族谚语占据着四川谚语主体地位。四川谚语是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结晶，也是汉族文化与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

先秦时，今四川境内居住着巴、蜀等古代民族，主要属于氐羌系和百越系。秦灭巴蜀后，建立郡县，汉族的前身古华夏族进入四川。以后各朝都有汉族入川。历史上主要有七次大的移民：秦汉时期的移民、三国及晋代的移民、南宋初年的移民、元末明初的移民、清朝前期的移民、抗日战争时期的移民、新中国建设大三线时的移民。以上的外省移民，其绝大部分是汉族。可以说，古代四川的汉民族虽然是外来人口与当地土著居民相融合的产物，但经过元末、明末两次大规模的人口锐减和随之而来的两次大规模人口涌入，清代以后，四川的汉族基本上是外省移民的后裔了。四川汉民族的这一形成特征，决定了其风俗的丰富多样。历数千年的迁移发展和民族融合，在四川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格局。同时，四川汉族又分东、西、南、北四个方言区，民风民俗也有异同，各个方言区的谚语也随之呈现出异同状况，更增加了四川谚语的地域性特色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与形式。汉族谚语是四川汉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创造和传承的，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历代汉族移民带入四川的，也成为四川谚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谚语，现在很难从四川汉族谚语中区别出来，但它们却带着原居住地的烙印，成为研究中国各地谚语异同的珍贵资料。

第二，多元深邃，繁盛皆博。

除汉族谚语外，四川和重庆少数民族谚语也非常丰富。这是因为，四川和重庆除汉族外，还聚居着13个世居的少数民族。据1990年7月1日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人口较多的有彝族(1 784 163人)、藏族(1 087 510人)、土家族(1 075 891人)、苗族(535 923人)、羌族(196 195人)、回族(108 638人)；人口在5万人以下，4 000以上的民族有蒙古、傈僳、满、纳西、白、布依、傣、壮等民族。此外，还有1949年以后由全国各地迁来的少数民族干部、职工。四川和重庆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都创造了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四川的经济是多元的，四川的文化也是多元的。四川谚语是由各个民族谚语构成的，也反映着四川多元经济和文化的特点。

远在新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就遍及巴蜀大地。他们所创造的原始文化，既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又与西北及中原的原始文化有关。先秦时期，四川的巴、蜀尚未进入华夏，基本上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巴与蜀既是两个方国，又是民族的称谓。当时巴、蜀两族尚统率众多民族，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儓、夷、蠶”，蜀国说其属有“滇、僚、賛、僰”。此外，蜀境内还有邛、笮、冉、駹、青衣等民族，巴境内尚有称为盘瓠种的民族。巴、蜀各民族在先秦时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广汉三星堆文化和涪陵小田溪巴王室墓葬群就是当时高度文明的杰出代表。秦汉以来，中原及其他地方人口大量进入四川，在历史长河中逐渐与巴、蜀土著融合形成汉族，但四川盆地东西两侧一直是少数民族传统居住区，这种状况迄今没有多大变化。应该说，四川各少数民族的谚语，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与汉族相比较是不同的。因此，四川少数民族谚语较多地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和本民族生活的地域特色。下面，仅以彝族、藏族谚语为例加以说明：

彝族谚语，彝语叫“尔比尔吉”，是彝族人民口语语言民俗中最为普及的一种口头文学，包含格言、谚语、典故，内容涉及彝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十分丰富。它的特点是：词句精炼，音韵铿锵，旋律和谐，想象丰富，句式整齐，吟咏上口。这种独特的艺术特色，是彝族人民根据自己长期的生活实践和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具有非常普遍而深刻的群众基础。男女老少都能使用最熟悉、最生动、最具体的谚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对事物的看法。彝族谚语在彝族人民生活和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彝族谚语，除具有谚语的一般社会功能外，还担负社会习惯法的功能。彝族主要用习惯法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大小问题。如果把彝族的习惯法视为“论说”与“实行”两个层次，则论说的层次是实行层次的理论依据和基础，而论说层次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有关习惯法内容的尔比尔吉。这类谚语，有的负载了彝族历史上人们处理纠纷案件的事例，有的负载了彝族古往今来的一些由习惯所形成的“刑律”，有的则负载了彝族历史上处理纠纷案件的原则。因此，彝族谚语在一般情况下，成了人们处理问题的依据，教育人们的警语，表扬好事好人的准绳，扶持正义、谴责邪恶的有力武器。在过去漫长的奴隶社会中，彝族谚语起

着不成文法、道德规范和习惯法的作用。对于广大奴隶群众来说，彝族谚语则是他们行动的指南，生活的力量，斗争的武器。

藏族谚语，藏语叫“克谐”。藏族人民对掌握谚语多而又会灵活运用的人，尊称为“克巴”，一般都是长者。藏族谚语是藏族人民生产生活和斗争经验的总结，并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它向人民群众传授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指导人们分清善恶是非，鼓舞斗争意志，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藏族民间英雄说唱史诗《格萨尔王传》，引用了大量的谚语，被称为“格萨尔谚语”。这部史诗大约产生于11世纪至13世纪之间，或者更早一些。史诗主要以藏族民间艺人“钟恳”（意为“说唱格萨尔故事的人”）的口头说唱形式在群众中流传。从各流传地区已发现的卷本（包括口头流传的）已达60余部、100多万行、1500万字以上。“格萨尔谚语”，是藏族社会漫长历史进程中各方面经验的结晶，是千百年来藏族人民群众日常用语的升华。在整个史诗中，随着说唱情节的发展，兴至酣处，谚语便油然而生，娓娓道来，犹如锦上添花，使论证的观点更加鲜明；叙述的情景更加清晰；刻画的人物更加栩栩如生，常常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格萨尔谚语”反映着藏区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反映了古代藏族社会部落之间的战争以及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习俗、风尚及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第三，以农为本，崇尚农耕。

农业是四川各族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活动，四川谚语则充分反映了四川农民执著的农耕信仰和观念以及农业生产的经验。土地是四川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万物生于土，万物归于土”，是四川农民执著的农耕信仰、农耕观念的反映。四川农民深知，“民以食为天”，土地是命根子：“庄稼靠土长，土是无价宝”、“树根在土，人根在粮”（彝族），“养活人的是良田，养活畜的是草场”（藏族）。靠土地生存的农民，把全副身心都扑到了田地上，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在农本、农艺，包括水利、土地、肥料、耕作、作物、苗种、田管、收割等，以及园艺、林业、畜牧、副业、渔猎等方面，都总结、创造、传承了大量的谚语，真可谓是一部精湛绝伦的农耕全书。比如，对水的关注：“土是本，水是命”、“一滴水，一粒粮，水里能把粮食藏”，并养成了“种田种地，兴修水利”的习惯。对气候的关注：“春旱夏涝，春涝夏旱”、“不怕日子苦，就怕秋老虎”、“雾下河，太阳多”（羌族）等。对蚕桑的关注：“种桑三年，采桑一生”、“蚕茧虽小，全都是宝”、“养蚕有四防，一防蝇二防蚊，三防闷热四防病”等。对渔猎的关注：“要鱼不发瘟，渔塘年年清”、“打鱼不离船头，钓鱼不离滩头”、“紧拉鱼，慢拉虾”、“趁浑水，搭虾芭（竹编捕鱼工具）”、“早钓鱼，夜钓鳝”、“五更虾，黄昏蟹”等。对种茶的关注：“三年粮食五年桐，七年茶子满山红”、“金山银山，不如茶树上山”、“高山雾多茶叶好”、“头茶不过立夏，二茶不过端午，三茶不过七月七”、“茶叶采来连夜炒”等。对百工的关注：“江湖艺人四海游，结情结义莫结仇”、“言语不拿顺，码头难得混”；木匠要“劈三年，创三年，学会刹锯大半年”；“学铁匠先打钉”；“漆匠不用学，只要漆得薄”；“酿酒做豆腐，到老

“没师傅”、“养子不当打石匠，天晴落雨在坡上”、“有女不嫁弹花匠，立着就像狗一样”、“邋遢泥人臭漆匠，没爹没娘做篾匠”、“修鞋工人实在苦，又脏又臭抱着补”、“百工有三苦：挖煤打铁磨豆腐”等。

第四，重文尚礼，张扬民性。

四川人民重文尚礼，张扬民性，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四川各族人民在经济上辛勤开发的同时，也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汉代蜀郡守文翁首倡地方政府办学，在成都创办石室讲堂，对繁荣古代四川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四川历史上名家辈出，最著名的有：西汉司马相如、扬雄以辞赋驰名于世、落下闳首制浑天仪观测天象；西晋陈寿著《三国志》，与《史记》、《汉书》齐名；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至今为研究四川以至西南历史地理的典籍；盛唐李白诗才横溢，为后代宗师；五代的“花间词”，独树一帜；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号称“三苏”，为诗文大家；秦九韶著《数书九章》，在中国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杨慎学富五车，以诗文和研究云南少数民族著称于世；清彭端淑、李调元、张问陶，著诗文词曲颇丰，号称“蜀中三杰”。至于历史上曾客居四川、创造了大量诗文的，则有唐杜甫、北宋黄庭坚、陆游等大家。偏处西南的四川，历代文化发展与中原最发达的地区并驾齐驱，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传播新思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在四川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四川青年中，再一次掀起了到海外寻求真理的热潮，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和领导人，其中有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聂荣臻、赵世炎、刘伯坚等。这一时期出川的青年中，还有著名的作家郭沫若、李尧棠（巴金）等。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建立了川陕根据地。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川，红四方面军进军川西北，同时红二方面军也入川。三大主力红军在四川境内长达一年零八个月。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都发生在川黔、川滇边境和四川境内；而爬雪山、过草地的壮举，则发生在川西北地区。

四川人具有机智勇敢、吃苦耐劳、诙谐幽默、尖刻直爽的性格。古代巴族、蜀族悍勇善战，且具幽默感。周武王伐纣，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华阳国志·巴志》）。蜀地与秦风俗相比，民多“悍勇”（《华阳国志·蜀志》）。四川人不乏吃苦耐劳、诙谐幽默的性格。纵观四川谚语，不难看出四川人民刚、柔相济，并体现两者的和谐统一。四川人民历来看重志尚，“不怕铁硬，就怕心坚”，“鸟无志不飞，人无志无为”。四川人尚勇，“要擒老虎到深山，要吃龙肉下海滩”、“丈夫不落穷途泪，好汉面前无困难”（土家族），“姑娘不美不去聚会，小伙不勇不上战场”（彝族），“坚固的岩石，是英雄坚强的意志；壮丽的山河，是英雄开朗的胸怀”（彝族），“英雄不住岩下，胆小不站河边”（羌族），“不畏崎岖路，才能攀高峰”（苗族）。从这些谚语中，可以看出巴族、蜀族古风的折射或投影。四川人民这种尚志和刚勇的民性、民风，是他们从艰苦环境中磨炼出来的。移之于国家和民族，表现在不畏强暴，敢于抗争，自

强不屈。“宁可站着死，不愿屈辱生”（亦作跪着生），“宁死不肯埋，宁死不墮志”（藏族），“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等，无一不是民族正气的表现。这些优秀的民族品格，充分体现在历代四川志士仁人和革命者身上，并成为后来者的榜样和人们崇尚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四川人民非常崇尚礼仪。民间明事理、讲团结、重感情、讲礼行、慎言行，成为人们普遍提倡的社会风气。“问理不问人，公理胜强权”、“事成于和，力生于团结”、“以心换心，相交至深”、“礼多人不怪，人到礼不亏”。而礼中突出一个让字：“让礼一寸，得礼一尺”，“出门让三子：老子、小子、女子”、“失礼应赔礼，得礼也让人”等。四川人民讲礼仪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四川人也从生活中逐步认识到刚柔相济的道理。民间认为做人不能太直，“树直遭斧伐，人直遭事磨”、“柔乃安身本，刚为败命根”、“人们会处事，不会招祸事”（彝族），“若会处事，口服众人；不会处事，口成仇人”。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做人也要有骨气：“人无刚，不如糠”。有没有骨气，关键是看人“有志没志”，“一人立志，万夫莫夺”。以柔克刚，刚柔相济，方为上人、上计。这是人们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哲理，也是对四川民性、民风的抽象概括。四川各个地方人的性格，也不尽相同，比如“成都人动口，重庆人动手”，即反映了各地人性格的差异。

四川的民俗文化是巴蜀文化的根基，也是各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具有极大的民族凝聚力。四川各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历史的风风雨雨，均有赖于民俗文化的创造和传承。本卷收录的方言谚语，比较系统，可以反映出各个民族的一些基本的文化心态以及它的多样性。各个民族，不同地方，一年四季的传统节日习俗，都有俗谚反映。各个民族的生、寿、婚、丧，以至命运、礼尚、信仰等，也有谚语表达。四川是道教的发祥地，也是佛教盛行之地，许多人却是不信神、不信佛的，比如：“神是巫师说的，鬼也是巫师说的”（羌族），“供起来是佛，玩起来是泥”、“世上无鬼神，都是人哄人”等，深刻地揭示了迷信神、佛的本质。当然，这并不排斥另一部分人对宗教的信仰自由。这些，都是四川人信仰意识深层文化意识形态的表现。

四川谚语与孕育它的当地自然风貌、人文环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四川山川秀丽，古代即有“蜀中多仙山”的美誉，这是与四川所处地理环境以及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鹤鸣山、青城山相关联的缘故。四川优美的自然风貌，向为历代人士所倾倒、歌颂。本卷收录风土谚近千条，在全国都是突出的。四川人的乡情十分浓烈：“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就连自己的家乡话也不愿更改：“离土不离乡，离祖不离腔”。各地流传的山水名胜谚语极多，有描绘特色的：“清风雅雨建昌月”（汉源县清溪乡风大、雅安雨多、西昌月亮最明亮），“朝天门，门朝天，长江嘉陵各一边”（重庆）；有赞颂景美的：“乐山看大佛，峨眉观日出”、“九寨归来不看水”、“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门天下雄”、“夔门天下险”、“巫山天下奇”、“不到四川，不知锦绣河山”等。四川物产丰富，名优土特产极多，比如：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中国茶馆数四川”、“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剑

南无酒不成春”、“涪州三件宝：榨菜、潞酒、豆腐脑”等。

第五，平实犀利，通俗藏雅。

四川谚语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除具备谚语通常表现出来的一些基本特征外，还具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从内容看，谚语首先具有经验性。它或源于直接感知，或兼含间接推理，或反映成功，或总结失败，无不是体验或观念的经验性结晶。谚语还富有哲理性。它总是升华带规律性的经验，洞察事物的本质，从而能够十分准确地表达出某种深邃而又闪光的见解，具有令人折服的说理性和训诫性。

从形式看，谚语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则无不具有通俗、上口的口语性特征。这一点甚至成为我们辨别谚与非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谚语又总是以最简约的形式，蕴涵最赅博的内容，表现出非凡的精炼性。任何复杂纷繁的事物、抽象深奥的道理，一旦进入谚海便出奇的精炼。谚语还以其高度的艺术性而被誉为“浓缩的诗”。在语言里，它既是特殊表达成份，又是艺术表达方式。它广用辞格，巧织句式，节奏鲜明，音韵铿锵。常见的形式是由两旬构成，也有一句、三句、四句、多句的；在技巧上，谚语还常常运用民间诗歌特有的排比、对偶、比喻、层递、倒装、设问等多种修辞手法，以增强其艺术上的感染力和论理中的说服力。

从语言看，平实而犀利，绵中带刺，柔里藏刚。四川谚语语言一般较为平实，但许多谚语语言犀利，绵中带刺，柔里藏刚。例如：“乌龟有肉在肚子里头”（意即藏而不露），“猫儿给狗搬甑子”（指为别人做好事），“耕地的是牛，吃草的是猫”（彝族谚语），“懒牛懒马屎尿多”（即是想方设法偷懒），“打鱼捞虾，饿死全家”（强调以农为主）等，用语犀利，但又绵中带刺，充满四川“麻辣烫”特色。有的谚语用语诙谐，如“裁缝不偷布，娃儿没得裤”、“左眼跳财，右眼跳挨”（“挨”即“遭”，要倒霉的意思），“见人屙屎沟子痒”（“沟子”即“屁股”），“四川不点状元，陕西不招驸马”等，令人会心一笑。

四川谚语是雅和俗的共存和交融。通俗而藏雅，粗而不野，俗而不庸，是其基本特征。有些谚语俗，有些谚语雅，而更多的是通俗流畅的口语精品，有着雅俗共赏的效果。例如：“狗狂吃屎，人狂有事”、“有烂泥鳅就有烂老鸦”、“大欺小来不倒”（意即不准许），“老鸦头上叫，谨防祸事到”、“放牛娃儿不要夸，三月还有桐子花”（指三月桐子花开时节还有寒潮到来，民间俗称“冻桐子花”）等等，既充满了善意的劝告，又通俗雅致。简洁明了，言简意赅，也是四川谚语的基本特征之一。有一些短型谚语，如“来者是客”、“言多必失”、“话丑理正”、“事怕三编”等，文字虽少，但句式却独立、完整、内容深刻。形象化也是四川谚语的基本特征之一。“人热则跳，秧热则笑”，在关键的字词上用得形象，把秧苗对自然气候的要求生动地表达出来了。人们总是就近取譬，因此形象化的特点也是最具地方性。继承民歌和成都竹枝词的某些传统，也使四川谚语常常出现一些比较雅致的修辞方法。如回环：“香水

山水香”(四川宜宾兴文县古宋城北香水山)、“城在水中，水在城中”(四川乐山市五通桥镇);谐音:“我见到山顶的杉树就想念表妹,我看见山谷的谷博便思念阿惹”(彝族),“杉树”的音调便与彝语“想念”谐同;“谷博(树)”也是与“思恋”谐音。但运用最多、精品也最丰富的,则要算对偶了。对偶源于自然,是形式美的法则之一。它的应用可使人产生整齐、稳重和沉静的艺术效果。如“一粒入土,万担归仓”、“生秧田,熟菜园”、“旱浇园,涝锄田”、“讨饭讨财主,打鱼打水浑”,均为工对。而“立春有雨农家乐,立秋无雨万人忧”、“清明断雪,谷雨断霜”,皆以专有名词入对,自然成趣。四川谚语在语法结构上,也常有自己的特征。如“荒田不荒水”,粗看近乎荒谬,其实是极言水对稻作的重要。又如“好看秧田难为谷”、“处暑前后落白米”、“黄金虽贵米下死”,按照一般语法规则都是解释不通的,可它符合当地的口语习惯,约定俗成。有些谚语则保留了古汉语的某些结构特点,如定、状语后置:“聪明话早,劳碌走早”;宾语提前:“开水多喝,强过吃药”、“只要人手多,石磨挪过河”等。

四川少数民族谚语,除具备汉族谚语一些基本特征外,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征。

彝族谚语有自己的修饰风格。比喻手法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修饰手法,但彝族谚语的比喻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即喻体可前可后。喻体在前的,如“猪狗解绳猛,骏马勒绳猛,勇士负伤猛”。喻体在后的,如“一千个能人的想法不会一致,一万匹跑马的脚印不会踩一处,一百个曲子的声音不会是一个调”。前例的本体要说明的道理或事物是“勇士负伤猛”,后例的本体要说明的道理或事物是“一千个能人的想法不会一致”。这种本体在前喻体在后的修饰方式,在汉语里少见且不大习惯,但在彝族谚语中则普遍存在,而且为人们所习用。彝族谚语的结构,有一句、两句和四句的,有的则发展到多段体。还有一部分谚语,渊源于历史传说、人物典故,意义生动而深刻,读后给人以深刻的教育,这类谚语对研究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与历史文化、思想意识等方面都很有价值。彝族谚语的表现手法也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有的能说能唱(谚语诗),具有浓厚的抒情韵味;有的比喻生动,言简意赅,一两句话就能阐明一个道理;有的用谐音来表达内容,妙趣横生。

藏语谚语的结构,有一句、二句、三句、四句、五句的,有的则发展到多段体,比如:“沙子里埋藏真金”(一句)、“神箭手弓不乱发,聪明人话不乱说”(二句)、“毁坏庄稼的是田鼠,败坏村庄的是强盗,整垮家庭的是懒汉”(三句)、“没有钱去做生意,等于去买债务,没有饭吃去找亲友,等于脸面换羞辱”(四句)、“骑马挎枪的小伙,不把父母挂在心上,仅管吃穿不用愁,有妻有儿有住房,再好脸上也无光”(五句)。长短句、多段句、分段句的藏族谚语也不鲜见。藏族人民有“出口成谚,放声即歌”的说法。还有一种藏族谚语,既热情又赋哲理性,以民歌形式传唱,被藏族人民称之为“歌谚”。此外,藏族史诗《格萨尔》谚语,它具有一般谚语的共性,但更具有个性,如语句较长,多数在四、五句以上,甚至有十几句、二十几句的;再者,因它是直接用于《格萨尔》这部史诗中的,所以也具有其特定含义;加之它言情叙事,隐喻较多,有的言在此而意在彼,如按一般谚语去理解,就将会不得其义。

四川谚语卷是集体劳动的结晶

本卷是在广集四川省和重庆市各民族谚语 41 余万条基础上,精选 2 万余条编辑而成的。自 1984 年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颁发《关于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后,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由省文化厅、省民委、省文联、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全省各市、地、州、县宣传文化部门培训文化骨干,发动群众,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全面普查、采录,并层层汇总选编成了 164 个资料本,又经过我们精选编辑成书的。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谚语的搜集犹如大海捞针,需要一点一滴、一句一条地积累,其工程之浩大、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正是靠着广大文化工作者默默无闻的埋头苦干和献身精神,终为本卷的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集成工作开展以来,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工作不甚平衡,但就普查面之广、采集量之多,已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中国谚语集成》编纂《方案》规定,“原则上以现今流传于世的作品为界,存于古籍而未见流传者,一般不予入书”。通过此次普查采集,全省“现今流传于世”的谚语,包括那些确已在口头流传而为群众所认可的新谚语,大体已掌握。真正集四川省和重庆市几千年和 14 个世居民族谚语之大成并编纂成书,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完成的大业。

本卷的编纂与出版,是一项在四川省和重庆市范围内囊括普查、采集、翻译(部分少数民族谚)、鉴别、遴选、分类、编排,以至审阅、出版等项内容的浩大的和系统化的工程。编纂《方案》总的要求,这些工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真实、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各民族谚语创作和流传的面貌,体现 80 年代我国对民间谚语搜集、整理、翻译、研究的水平及成果”。根据编纂《方案》的总体要求,本卷把确定一个明确的编辑指导方针放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由于四川谚语存在“两种文化”现象,加之许多谚条流传久远,时空跨度甚大,作为历史的产物,不能不受到时代的,思想观念上的局限。其中有些作品难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的、迷信的、宿命论的观念。因此,我们在选收作品时,始终坚持批判地继承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认真区别对待。凡属内容反动、格调低劣、对人民群众有害无益的作品,一律剔除不收。当然,我们也同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始终注意把不同时代产生的作品,放回到各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去进行分析、观察,并从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多方位地去审评它们的功能与价值,而力求避免用今人的眼光去机械地、简单化地苛求和否定前人之作。凡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揭示作用和认识价值的作品,尽管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已失去借鉴意义,我们依然予以收录。总之,既注重社会效益,

又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二者兼顾,审情筛选,是本卷的编纂过程中贯彻始终的编辑指导方针。

根据编纂《方案》的总体要求,本卷对入选的作品严格贯彻“三性”原则,即一讲“科学性”,务求采集、整理、翻译、鉴别以至编排等各个环节,都具有忠实性、准确性,反对无视科学的随意性;二讲“全面性”,务求全书所收作品,基本囊涵四川省和重庆市现今14个世居民族的各类谚语,包括富有实用和研究价值的异文变体;三讲“代表性”,务求入书作品业已经久流传,有较强延续性和一定覆盖面,在本地区、本民族中有一定影响。凡属乡土味较浓的本地区代表作,尽量多收;由于四川省和重庆市人口中移民占绝大多数,跨省的“通用”谚也择优入书。这三条原则,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既明确了本卷的学术准绳,又尽量符合国家编纂工作的统一规范,以保证本书应有的质量。

根据编纂《方案》的总体要求,本卷按内容分类方式建立自己的编辑体系。四川谚海的内容复杂,但为增强本卷的可读性和可利用性,我们仍采用了按内容分类体系。要求作品归类的各就各位,依类相从,并照顾各类作品内在的联系,以供查阅方便。入书谚语的内容分作“大、中、小”三个层次,进而在各个层次中按内容立目划类,力求把一颗颗微雕艺珠的谚语,有层次、有条理地贯穿起来。这样,全书在宏观上自成系统,又让积压类充分展示四川谚语的百态千姿,有利于不同文化水平、多种生活阅历的读者检索。

本卷的编辑工作,限于编者水平,遗漏和不足在所难免,殷切期望读者和专家赐正。

《中国谚语集成·四川卷》编辑委员会

公元2003年3月于成都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1)
事理谚	
说理.....	(3)
重理.....	(3)
有理.....	(6)
无理.....	(8)
常理	(11)
真理	(11)
属性	(12)
规律	(24)
关联	(33)
因果	(46)
两面	(61)
限度	(71)
演变	(79)
对比	(84)
主客	(84)
真伪	(89)
善恶	(94)
美丑	(98)
爱憎	(100)
是非.....	(105)
得失	(109)
祸福	(114)
相对	(117)
知行.....	(130)
见习.....	(130)
实践.....	(133)
修养谚	
志向.....	(145)
胆识.....	(155)
品行.....	(166)
才智.....	(194)
求知.....	(201)
惜时.....	(215)
谦慎.....	(220)
社交谚	
社群.....	(251)
群体.....	(251)
个人.....	(266)
交游.....	(272)
重情.....	(272)
择友.....	(276)
结交.....	(279)
应酬.....	(287)
礼教.....	(287)
人情.....	(290)
待客.....	(292)
做客.....	(296)
处世.....	(298)
处事.....	(298)
警世.....	(310)